



苏尼特右旗。
夜里吃完饭，一出门，下意识看了一下漆黑的天空。

星子，只有三两颗。其中一颗，格外明亮。好像宝石一样，美丽，如梦似幻。

借着饭店的灯光，突然发现，亮晶晶的、小得几乎看不见的水晶一样的微粒，从眼帘前徐徐落下。像是极小的翅膀在一张一合，又像是在空中翻滚一样。动作轻盈，飘逸。

是下雪了吗？我似乎有点不敢相信。天空里还有星星在闪烁。

是下雪了。当地的朋友回答。
哦，下雪了。在星子还挂在天空的夜晚，雪花悄然而至的景色，记忆中似乎很少有痕迹可循。我有点吃惊，又有点兴奋。

气温零下十几度，我打了一个寒战，裹紧衣服，钻进了车里。

回到宾馆，我站在五楼房间的窗前，好奇地凝视着外面的街道、路灯，可是，雪花的颗粒太小了，隔着这一段小小的距离，我根本无法看清。我有些失望，很快，我调整一下情绪，安慰自己：明天，雪一定会下得很大。

在北方，在边境，在辽阔的大草原上，与雪相遇，是不折不扣的人生第一次。这是小雪节气的最后一天，明天是大雪，雪悄无声息地来了，像是童话世界的小精灵一样，顽皮，淘气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五点多钟，天还黑乎乎的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走出了宾馆的大门。

路灯下的街道上，落了薄薄的一层雪。小小的雪花，还在天空里飘着。谧静的小城，还在梦中。我期待和憧憬的大雪，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，没有来，但地上总算有一层薄薄的积雪了。

八点多，天大亮，视线非常清晰。天空里出现了一抹橘红的色彩，似乎天要放晴了。令我惊讶的是，雪花还在飘落。而这雪花，似乎叫雪花有点不大确切，只能算是小小的颗粒，像是海边的细沙，或者沙漠里细小的沙粒。

草原上的雪，初识。一会儿下，一会儿停。一会儿晴，一会儿阴。停停下下，下下停停，持续的时间都不长。但小小的雪粒，并不黏人，无论衣袖，还是肩头，雪粒都不肯停留。它们像是急急忙忙要和落在地上的小伙伴们会合一样。这样的雪中小景，记忆中也是罕见的。

也许不想让我这个初次在草原观雪的旅人失望，也许是为了提醒和证明今天是大雪节气的第一天，鹅毛大雪终于纷纷落下。老熟人，老朋友，它们像是从我遥远的童年里而来，与我久别重逢。久违了，我的朋友！亲切之感油然而生，我有一点感动。

匆匆相遇，又匆匆告别。鹅毛大雪很快停息了。这个世界上许多美丽，都是如此的。瞬间，若不抓住，就会失之交臂。而我，算是幸运的人嘛。

十一时，我乘坐的小车驶出小城，向郊外进发。并不宽阔的公路上，没有积雪，路面也没有结冰。车窗外，草原一片枯黄，近乎泛白的土地，与干枯的荒草浑然一体。远处，一动不动的蒙古马，雕塑一样。朋友说，马的站姿是很讲究的，有学问的，比如说朝风、避风。我只能在心里暗暗钦佩，人生处处皆学问。

突然，我有一种眩晕的感觉。好像我在大海之中，感受到了波涛汹涌的恐惧一样。公路的路面上，不时出现波浪涌动的幻象。

我问道：“前面飘动的是雪吗？”朋友笑着回答：“是的，我们叫风吹雪。这种天气还好，要是遇上白毛风，麻烦就大了。”

风吹雪，曼妙的名字。美，有趣。

但我终如一粒雪，要被风吹得离开草原了。人生如风，人如雪粒，我们都被裹挟着，身不由己。但愿，每一粒雪，都能落在自己喜欢的地方。

由左翼文化的基因与各个时代的精神熔铸成的先进文化传统，值得珍视和研究。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诗与诗者

梁鸿鹰

在我看来，诗不会是对厚实储备的现成挖掘，它比小说、散文、非虚构更像是某种放弃，放弃得多，成为诗的机会才大，诗是少，是减法，是一种萃取。为了写一首诗，你必须舍弃构思另一首诗的机会，放弃观察或思索某些东西，比如那些在很多城市都能经常见到的，可能对你就毫无意义。你也要放弃面对很多人，而选择与另外一些人争吵。

诗是一种坦白，万物在诗里，不再掩藏自身，在你的面前，她必须露出本来面目，不得不向你坦白一切。

诗不是对所谓好的追求，为写下一首诗，你必须远离那些简单的“好”，你所追求的，应该是在写一首诗过程中的难、险和阻碍，不应追求必须“好”，在哪里受到阻碍，哪里就有好，写诗考验你如何善于远离一般人眼中的好。

诗虽像是一种知，但更是对知的向往，不必试图了解各种禽、鸟、兽，因为你没有时间，你也不必试图与所有物质对话，即使你所经见和了解

人要获得成就，肯定需要自我的努力，孔子说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圻也”，意思就是说自身质地不行，别人想帮忙都很难，但同样，我们的成功也离不开机遇。所谓“机遇”包括两种东西：一是时势，二是愿意提携你的贵人。

曾国藩出身于湘中一个普通自耕农家庭，食仅裹腹，衣仅遮羞，在官场没有任何背景，却因为做人的纯朴和干事的认真得到太常寺卿唐鉴和一品大员、军机首辅穆彰阿的赏识，他们频频向道光帝推荐，曾国藩因此十年七迁、连升十级，比某些有背景的人还升得快。老舍早年丧父，平时就靠母亲给人缝缝补补过日子，家中穷到有时连锅都揭不开，他九岁了还没进小学。富裕的刘寿锦（宗月大师）心生怜悯，资助他上学。因为有了刘寿锦，老舍才有机会成为著名作家。

史学大师钱穆在年轻时也遇到过一次美好的心灵救援。17岁时，钱穆被推荐到无锡一所小学教书，校长叫秦仲立。秦仲立“救援”的方式是让钱穆不断地为自己“做事”。某次，钱穆获得了《东方杂志》征文三等奖，秦仲立对他

说：“我在读商务印书馆的函授课，前几天那边寄来了考试试卷，上面有篇作文，

我没有时间写，你能否代我写一下？”钱穆听后有些不高兴，又觉得不能驳了校长的面子，写好后托人转交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又见到了秦仲立，秦仲立说：“当初介绍人说，给我介绍一个共同学习的人，没想到你还真是。我这儿有很多书，一个人根本读不完，想请你代读一些，读完告诉我书中大意，我好节省些时间做其他事情。”说完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严复翻译的《群学肄言》，要求钱穆将书里的生字一一查出来，把注释写在小纸条，贴到书上。钱穆觉得这个校长真懒，连书都要别人帮着读。钱穆按要求读完了书。此后，秦仲立又要求他代读严复翻译的其他一些书，还让他代学世界语。理由一样：替他读，讲给他听。多年之后严复才明白秦仲立是以这种方式栽培、帮助他。

做“隐形”贵人表面看并不难，既不耗体力，也不需要花费金钱，其实它需要一种格局：愿意管闲事。所谓“闲事”，就是不管这些事，你没有任何损失，管了，也未必得到什么回报。不过，这些“闲事”对别人却会特别有意义，有的甚至关系到他们的人生方向。这样的付出本质上是一种大爱。

世间还有什么东西比不求个人利益的大爱更能打动人的呢？

说到自己和《新民晚报》还有《夜光杯》的缘分的开始，都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

那时我还在南大读研究生一年级，教我外语的老师姓刘，他大概已经四十多岁了，个子瘦高，面容清瘦，略有花白的头发总是很整齐地分成三七开，他很讲究衣着，经常穿一件黑色的短款风衣和深色的西裤，显得风度翩翩。而和之前大课的英语老师中英文夹杂不同，他上课时几乎从不说中文，自始至终，他都讲一口标准的英式英语，而且叫我们必须用英语回答问题，这让之前很少开口“说”英语和“听”英语而只会“读”英语和“看”英语的我们很紧张，因为不是听不懂他讲的内容和提的问题，就是因为“词”穷而不能回答他的问题，除了少数几个同学可以对答如流之外，我们大多数人每次都是结结巴巴，言不及义。所以，我们都对刘老师“敬”而远之，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，都尽可能远离他，以免被他记住面孔，到时课堂上被他拎起来说英语而尴尬。可有一天

黄昏，我到南大门口的报亭去买本读书杂志时，一抬头忽然发现刘老师就站在我身边，正拿了份还散发着油墨味道的《新民晚报》在付钱，而且刘老师显然记得我是他班里的学生，还问了我声好，因为紧张，我已经忘记他是用英语还是汉语问我好了，出于礼貌，我只好硬着头皮搭讪了一句，问他为什么会买《新民晚报》看。因为南京人一般都会买《扬子晚报》看，而他买的却是上海的报纸，所以我才急中生智这么问他。

“哦，我是上海人。”
刘老师付好钱对我简单地解释道。我这才明白过来他为何要买《新民晚报》了。现在想想，那时没有网络，南京和上海之间坐火车最快也要四五个小时，刘老师要想了解家乡的情况，大概也只能看晚报了。不过，这次与刘老师这个生活在南京的上海人的邂逅，也让我有了买张《新民晚报》看看的想法，

因为我女友也是上海人，而我已经准备研究生毕业后去上海工作。

从此以后，我也经常在下午去报亭买张《新民晚报》看，有时碰到刘老师我也会主动问好，简单地对答几句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刘老师最后给我的英语成绩还不错。不过，不知道是因为在南大的上海人太多还是因为上海很有吸引力，我有时去晚了，报纸竟然会卖光。而打开晚报，最吸引我的就是“夜光杯”栏目。因为“夜光杯”的文章虽然风格多样，但还是以散文随笔为主。当时我在南大是学现代文学专业的，觉得《夜光杯》的随笔很像周作人在《美文》里提到的“美文”，因为这些“美文”既可抒情，也可叙事，还可评论。同时，这些文章不以事小而不表，只要是生活的趣味，不管是花虫鱼鸟还是苍蝇之微，都可以诉诸笔端，而上海的家长里短、里弄烟火，也不以鄙俚而不登版面，至于谈文

门熟路而殚精竭虑，抗拒坦途的达成，反对修成一条条可能通向乐园的道路，诗作了乐园的死敌。

诗不反对词语的各种回环往复，但一意拒绝同类的拒绝。

诗者的想象与其说是头脑风暴的起义，不如说是各式各样惊蛰，埋伏在朝露晚霞的挣扎中，永远不能指望如期而至。

诗者注定永远不会自由，不能像押宝期货那样囤积想象，你要是写诗，就要像被投入大牢的死囚一样，永远陷入琐细的迷茫、无望的求证。

诗者休想期待灵感偶遇，每一次相逢都是一次逆袭，你有幸学写诗，就要为各种坎坷作好准备，义无反顾地与各式各种舒适的变种搏斗，一旦与诗长时间相厮守，你便会不断遭遇书写之中的反复无常的拆解，把与灵感的分离当成另类相聚。

诗不是生活中应该被忘记的东西，当有人问你，还有哪些应该被忘记，那就得告诉他，所有的，一切，都应该被忘记，只有诗

不能忘记。所有的非，所有的否定，或许就是诗本身。

诗不是具体透明的显在，越是某些迄今依然难以言说的，越可能是属于诗的。

诗也不会是确切的孩提时光；也不是为你的父母双亲预备的，那些事先准备好的，热气腾腾的东西，诗是寒凉，那些一意给人以趣味的，或者想方设法带给你一些欢乐的，或许根本算不上是诗。

诗者承受得住悲观，只不过倾向于掩埋具象的悲观而已，你不惧怕悲观，不惧怕他人的理解，你不惧怕伤自己的脾胃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某些欢乐很可能是悲观的循环补品。

诗轻易不会弄错自己的角色，她不负治愈自己在不同时期易于罹患的病痛：童年时代的诚实，青年时代的轻信，中年时期的狂热，老年时代的尖刻，诗带着患过的各种疾病，记得那些疾病发作时的各种症候，一直拖延下去。

诗对诗者要求过于严苛，诗者预备翻越文字之山，探向夜的深渊，放弃猜测，弃绝心智的随意变化。诗者须能回想起那些

要尊重自然。各种植物的花的授粉，有的通过昆虫的，有的通过风，万物都是如此精确地被安排好的；再比如各种植物的叶子，它们的生长方式比如有互生轮生对生等等，都是为了它们自身对光照的需要作出的精确安排；再比如种子的传播规律，有通过动物（例如鸟类）传播的，有通过风来传播的，也有通过流水来传播的，不一而足。尊重自然其实就是对自然有敬畏，对宇宙秩序的敬畏。因为有了敬畏，我们就会变得谦卑，就会看到自身的渺小。

论艺，阳春白雪，也当讲讲，更有针砭时弊的言论努力发声，真可谓“方寸”之间，得以尽窥上海这座城市的思想态度与生活姿势。

转眼研究生毕业，我顺利到上海交大工作，与女朋友成家，而家里始终就订有一份《新民晚报》。可有次我在家附近的报摊上看到《扬子晚报》，忽然觉得很激动，就买了一份，而就在一刹那间，我突然想起了刘老师，也忽然理解了他当年看《新民晚报》的心情。

也许，几十年来，新旧上海人，或者对上海这座城市有兴趣的朋友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会想看新民晚报，看“夜光杯”的美文，以怀念和感受一下活色生香的上海的生活的态度和文化的气息吧。对一张报纸和一个栏目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感到骄傲和难忘呢？

我与夜光杯美文 责编：吴南瑶



吉祥蒙古 (油画)

韦尔申

不能忘记。所有的非，所有的否定，或许就是诗本身。

诗不是具体透明的显在，越是某些迄今依然难以言说的，越可能是属于诗的。

诗也不会是确切的孩提时光；也不是为你的父母双亲预备的，那些事先准备好的，热气腾腾的东西，诗是寒凉，那些一意给人以趣味的，或者想方设法带给你一些欢乐的，或许根本算不上是诗。

诗者承受得住悲观，只不过倾向于掩埋具象的悲观而已，你不惧怕悲观，不惧怕他人的理解，你不惧怕伤自己的脾胃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某些欢乐很可能是悲观的循环补品。

诗轻易不会弄错自己的角色，她不负治愈自己在不同时期易于罹患的病痛：童年时代的诚实，青年时代的轻信，中年时期的狂热，老年时代的尖刻，诗带着患过的各种疾病，记得那些疾病发作时的各种症候，一直拖延下去。

诗对诗者要求过于严苛，诗者预备翻越文字之山，探向夜的深渊，放弃猜测，弃绝心智的随意变化。诗者须能回想起那些

要尊重自然。各种植物的花的授粉，有的通过昆虫的，有的通过风，万物都是如此精确地被安排好的；再比如各种植物的叶子，它们的生长方式比如有互生轮生对生等等，都是为了它们自身对光照的需要作出的精确安排；再比如种子的传播规律，有通过动物（例如鸟类）传播的，有通过风来传播的，也有通过流水来传播的，不一而足。尊重自然其实就是对自然有敬畏，对宇宙秩序的敬畏。因为有了敬畏，我们就会变得谦卑，就会看到自身的渺小。

论艺，阳春白雪，也当讲讲，更有针砭时弊的言论努力发声，真可谓“方寸”之间，得以尽窥上海这座城市的思想态度与生活姿势。

转眼研究生毕业，我顺利到上海交大工作，与女朋友成家，而家里始终就订有一份《新民晚报》。可有次我在家附近的报摊上看到《扬子晚报》，忽然觉得很激动，就买了一份，而就在一刹那间，我突然想起了刘老师，也忽然理解了他当年看《新民晚报》的心情。

也许，几十年来，新旧上海人，或者对上海这座城市有兴趣的朋友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会想看新民晚报，看“夜光杯”的美文，以怀念和感受一下活色生香的上海的生活的态度和文化的气息吧。对一张报纸和一个栏目来说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感到骄傲和难忘呢？

我与夜光杯美文 责编：吴南瑶

我与夜光杯美文 责编：吴南瑶

我与夜光杯美文 责编：吴南瑶

我与夜光杯美文 责编：吴南瑶



观雪

安武林

